

中國天主教城市化牧靈格局的困難與 展望——以大灣區廣東為例¹

甘俊邱、張闊

[摘要] 中國改革開放的四十年間，經濟迅速增長，城市化建設方興未艾，人口逐步從農村向城市遷移。國內教會主要以農村為主的模式，因著城市化的發展，農村教會似乎被釜底抽薪一樣失去了主要牧場，故而導致農村教會萎縮，城市信徒增多的局面。然而，四十年來，國內教會將人力、物力大舉投放於農村教會，而城市教會的各方面建設匱乏，導致教堂稀少、人力資源不足、管理模式滯後、城市牧靈乏力；城市化亦導致教區劃分的諸多問題。廣東教省毗鄰港澳區域，港澳教會城市化牧靈的成功經驗，對廣東教省的發展有莫大幫助；大灣區的規劃亦帶來區域性教會的合作機會，打造廣東教省城市化教會的範本，無疑對國內整體教會，或城市化教會，具有典範試點作用。

Abstract: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China in the past 40 years, the economy has grown rapidly, leading to the flourishing of urban construction. The population has gradually moved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Since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is mainly based in the rural areas, urbanization has resulted in the shrinkage of rural churches and the increase of

1 本文部份內容輯錄自張闊，〈城市化對中國牧靈格局的影響〉，《神學研究》39.1（2017年）。

urban believers. However,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Church in China has invested heavily in rural churches in terms of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he lack of urban church construction in various aspects has led to a scarcity of church buildings, insufficient human resources, a lag in management models, and a weakness in urban pastoral work. Urbanization has also led to many problems arising from setting the boundaries of dioceses. The Guangdong ecclesiastical province is adjacent to Hong Kong and Macau.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urban pastoral work of the churches in Hong Kong and Macau are a great help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 ecclesiastical province. The planning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Southern China also brings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in the form of regional churches. The model will undoubtedly serve as a model and pilot project for the Church in China, or for an urbanized church.

一 社會城鎮化

1 城鎮化現狀與趨勢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在 2001 年世界銀行會議上提到：「在 21 世紀初期，影響世界最大的兩件事：一是新技術革命，二是中國的城市化」。中國的城鎮化發展，不僅僅影響著中國 13 億人口，也直接影響著中國的經濟結構的轉型，人文結構的轉型，更是對全球的經濟產生莫大的影響。

在中國的的現代化進程中，城鎮化是必然的道路。城鎮化一詞主要包含四個方面的意義：一是人口的轉換，即農業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換；二是地域的轉換，即農業用地向城市用地的轉換；三是經濟結構的轉換，即從農業向非農業結構轉換；四是生活方式的轉換，即由農村生活方式轉變為城市生活方式。²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工業化進程加速，城鎮化經歷了一個起點低、速度快的發展過程。「1978-2013 年，城鎮常住人口從 1.7 億人增加到 7.3 億人，城鎮化率從 17.9% 提升到 53.7%；城市數量從 193 個增加到 658 個，建制鎮數量從 2,173 個增加到 20,113 個」。³ 依據 2014 年底國發 2014 第 51 號檔《城市規模

2 黃劍波，《都市裏的鄉村教會：中國城市化與民工基督教》（香港：道風書社，2013），頁30。

3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新華網》，2014年8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city/2014-03/17/c_126276532.htm。

劃分標準調整方案》，中國城市人口規模劃分標準為五個類別：(1) 超大城市：人口 1,000 萬以上；7 個超大城市；(2) 特大城市：人口 500 至 1,000 萬；11 個特大城市；(3) 大城市：人口 100 至 500 萬；150 個；(4) 中等城市：人口 50 至 100 萬；220 個；(5) 小城市：人口 50 萬以下；300 個。

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不斷的推進，「兩橫三縱」為主體的城鎮化戰略格局基本形成，預計到 2020 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 60% 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 45% 左右，努力實現 1 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的經濟迅速增長，城鎮化方興未艾。瞻望未來 20 年，中國的城鎮化依然會加速持續，因為城鎮化的發展是中國經濟增長或轉型的重要切入點。根據建設部的預測：到 2020 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將達到 55-60%，城市人口將達到 8-8.5 億。麥肯錫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到了二零三零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將達到十億。中國的城市將增添三億五千萬人，超過現時美國的總人口」。

城鎮化進程刺激產業結構的調整，由人口數量的分佈而言，小城市會逐漸向大城市轉型，大城市會向特大城市轉型，城市的數量會不斷的增加，以容納由農村遷移出來的人口數量。隨著農村生產力的提升，農村的剩餘勞動力會逐漸的釋放出來，而城市化人口的增加，農村人口成為了主要的來源，未來人口大規模的遷徙將超過以往任何形式的遷移。

2 國內移民

1954年《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自由」，但自1958年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戶籍管理登記條例》規定：「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准予遷入的證明」。⁴這是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流動的開始，標誌著城鄉分離的「二元結構」體制的形成。

在城鄉二元結構下，公民被人為地分為「農村」和「城市」兩個部份，在社會上形成了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兩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上有重大差別的社會等級。城市戶口享受城市的社會保障福利，而農村戶口則唯有自力更生，與城市產生了極大差距。因此，數量巨大的農村人口必須進城務工，方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質。移民是城鄉分割下二元社會結構的真實寫照，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差距是催生農村人口遷移的誘因。

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報告顯示，2013年全國人口13.6億，城市常住人口為7.3億，其中包括2.45億的流動人口（移民）群體，鄉村6.2億。⁵社會人口結構的

4 該《條例》頒佈之後，中國逐漸形成了嚴格區分城鄉戶口的制度，逐漸形成了兩種人口：一是大約佔人口80%的農業戶口，二是大約佔人口20%的非農業人口。在此背景下，逐漸形成城鄉「二元結構」格局和非農業人口與農業人口的「身份制度」。

5 〈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頁，2014年2月24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2/t20140224_514970.html（2014年4月5日存取）。

城市人口數量首次多於鄉村人口，這是改革三十年發展歷程中，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突破性轉移，這也是中國歷史上人口結構的變革。2014年7月30日，中國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⁶中國取消戶籍制度的差異，而由此制度所造成的戶籍差別、身份差別、公民待遇差別等，也會在歷史的進程中得以取消或改善。

農民向城市移民的三十多年歷程，改變了中國社會的人口結構，由過去的農村人口多數為主到目前的城市人口佔多數，而且以此為前景；社會結構的城鄉二元區隔的涇渭分明，也在移民進程中得以跨越。當下戶籍制度的取消，更彰顯出中國的社會進程踏上了新的發展階段。

二 城鄉教會牧靈格局

1 農村教會的萎縮

中國天主教在歷史上的移民，由於朝廷禁教，一些城鎮的教友便移民到偏僻落後的山村或邊陲，由此形成了教友村。比較有代表性的如鄂西北的磨盤山、浙江西部的麻蓬村、河北張家口的西灣子、河北石家莊的本篤莊，以及內蒙的二十四頃地等等。⁷如今，中國社會城市化的推行，由於經濟的緣故，農村人口走向城市，農村教友亦向城市發展，歷史的進程又把教會推向了城市。

6 〈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中國新聞網，2014年7月30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7-30/6439778.shtml>（2014年8月1日存取）。

7 康志傑，〈關於當代天主教信徒移民的調查報告〉，《信德學刊》第6期（河北：信德文化研究所，2013），頁177。

農村人口萎縮，農村的教會教友人數亦然，呈現出空缺的現象。關於中國教會信徒在城鄉的分佈比例，「對於農村信徒所佔的比例幾近一致，均認為農村信徒佔到總信徒的 70% 到 80%」。⁸ 中國教會以農村教友為主的現象業已改變，過去農村教會的教友鼎盛，人丁興旺，而如今卻教堂冷清，城市堂區人聲鼎沸。以鄂西北磨盤山教友村為例：「信徒鼎盛時期有六千餘人，改革開放後教會恢復活動有三千餘人，2012 年，信徒下降到一千餘人，平常參加彌撒禮儀者只有幾百人」。⁹ 農村教會的衰落廣泛的發生於全國各地層面，而非一區一地，例如：「河北省張北縣二泉井堂區原有一千五百教友，現在只剩下二百餘人。河北省威縣張莊，在過去三十年裡，約五份之三的天主教徒離家去城市打工。山西省太原教區的紅溝村曾有幾千教友，如今那裡只餘下幾百教友；重慶教區南川堂區位於重慶市郊，過去有兩千教友，今天只有不足五百人」。¹⁰

農村因著移民的外出而盡顯空缺與冷清。農村教會呈現出三多現象：老人多、婦女多與兒童多。農村社會因著青壯年的流失而缺乏活力，留下的是老年與少年，其中一代人的缺乏導致農村的衰弱，其處境令人堪憂，教會亦然。中國教會長久皆以農村牧靈為主，而如今農村卻已是人去樓空，大多出外工作。城市化造成了對中

8 許淳熙，〈城市化進程中基督宗教信眾結構與活動方式的變遷探析〉，《信德學刊》第6期，頁14。

9 康志傑，〈關於當代天主教信徒移民的調查報告〉，頁177。

10 張文西，〈城市化對中國基督徒影響的牧靈反思〉，《鼎》第171期（2013冬），頁6。

國農村教會的整體性衝擊，中國教會需要調整目前的牧靈格局，面對農村教會的萎縮與城市教會的興旺，制定相應的牧靈計劃。不以農村堂口為主，而以城市為重，從過去的農村策略轉向為以城市化為主要的方向。

反觀城市堂區教友的增加，亦可看出農村教會的衰弱。農村教會的萎縮已然成為了一個事實，面對農村教友的流失，如何牧養留守教友成為了當務之急。留守教友所呈現的年齡、性別等皆成為牧靈首要考慮的條件，依據留守的農村教友的特徵而實施相應的牧靈計劃。

2 城市堂區的匱乏

中國教會三十多年的牧靈主要集中精力於農村，教堂大多以農村為主，因而在牧靈及福傳方面仍然是與農村環境有關，以農村牧靈模式為主；而城市教會的發展卻相對落後，城市堂區的缺乏便是例證。

保祿宗徒所去的大都市皆是當時交通、文化、商業、政治和宗教的中心。保祿選定這些代表性的都市，並建立基督信仰的基礎，顯然是希望福音能從這些策略性的中心點帶到週邊的鄉鎮裡去，¹¹「主的聖道由你們那裡，不僅聲聞於馬其頓和阿哈雅，而且你們對天主的信仰也

11 代表性的省級都會：馬其頓的斐理伯（斐4:15）；得撒洛尼（得前1:7f）；亞該亞的格林多（格前16:15；格後1:1）；亞細亞的厄弗所（羅16:5；格前16:19；格後1:8）。參閱David J.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c1991), 130.

傳遍了各地」（得前 1:8）。「在教會早期，巴勒斯坦的鄉村文化被拋在一邊，希臘羅馬城市成為了基督信仰運動的主要場所。這場運動跨越了羅馬帝國社會的兩大基本階層，即鄉村人口和城市居民」，¹² 其結果證明意義非凡。

目前中國天主教有教堂 6 千座左右，¹³ 面對近 700 座大中小城市，平均下來每座城市不到 10 座教堂，而再以十之七八的教堂處於農村的話，那麼推算的結果是平均在城市市區裡的教堂為 2-3 座。城市教堂的缺乏不是一地一區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教會的現象，例如：吉林省吉林市 1 座；天津市區 3 座；山西大同市有 1 座，汾陽市 1 座；河北滄州 1 座，保定 1 座；河南安陽 1 座；湖北武漢 4 座；貴州貴陽市區 2 座；四川成都市區 1 座；廣東惠州市區有 2 座；甘肅天水市區 2 座；寧夏銀川市區 1 座等等。不論是南與北，東和西，大城市或小城市皆呈現出市區教堂缺乏的現狀，而且現今有些城市看似增加一兩座教堂，亦是由於城市化原因，而非主動性建設。亦有不少城市教會，在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竟然沒有在城市興建一座教堂，此情此景著實令人咋舌。如今面對城市化的進程，移民教友只有增加的趨勢，以及新教友的日趨增多，城市教堂的缺乏愈發明顯不足。

12 貝萬斯、施羅德合著，孫懷亮、柯博識、雷立柏合譯，《演變中的永恆：當代宣教神學》（香港：道風書社，2011），頁 81。

13 李光，〈內地基督教教堂數量調查：宗教供給稀缺現狀暫難改觀〉，《中國民族宗教網》，2010，<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48485-1.htm>（2014年4月25日存取）。

2015年中國教會復活節領洗人數為兩萬，其中突出的是城市領洗人數高於農村，以及移民和學生領洗的比例高。從領洗的數字看，很多都是外地的移民。移民教友的增長及領洗數字顯示出城市教會發展的面向，呈現出城市教會對於城市牧靈與福傳拓展的瓶頸狀態，一方面說明移民需要教會的關顧，另一方面亦說明城市教會需要大力度面向城市人群牧靈與福傳。尤其遇到春節回鄉，城市人去樓空，教堂冷清，方才是城市教友的本來數字。城市教會的牧靈與福傳需要尋找新的模式。

羅馬書 16 章 3 節，保祿提及阿桂拉和普黎斯加，問候在他們家的教會，至少有四個家庭教會在保祿的問候中被提及（16:10, 11, 14, 15）。¹⁴ 移民教友從農村到城市，卻很難找到教堂，並因城市教堂稀少而導致信仰衰落，應引發教會對牧靈與福傳的整體規劃策略的轉變，而在城市教堂普遍缺乏的當下，聚會點或家庭聚會是最佳的方式。城市教會與教友應該支持城市興建新聖堂和新中心的地點，克服傾向於回村落興建聖堂的情感趨向。

三 城市化背景中的教區建制問題

1946年，教宗比約十二世頒佈宗座憲法，宣佈在中國成立教會聖統制，將中國所有代牧區，一律晉升為教區。劃分為 137 個教務區域，成立二十個教省，並指定每教省總主教的座堂地區，以及其所隸屬的各個教區。時

14 Samuel Escobar, "Migration: Avenue and Challenge to Mission,"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31, no.1 (Jan 2003): 24, <http://mis.sagepub.com/content/31/1/17.short> (retrieved July 10, 2014).

隔七十多年後的中國，中國日新月異，城市化現象逐漸擴展，1978-2018年，城市數量從193個增加到393個地級市（不包括直轄市、特別行政區），374個縣級市。面對城市格局的變化，之前的教區劃分面臨諸多不便。

1 缺乏教省的教區

依據《天主教法典》，教區制度屬於第二卷第二編，標題為「教會聖統制」。教會法典431條2項，「今後按常規不得有不屬教省之教區，故此在某教省內的各個教區及其他地區教會，皆應屬於該教省。」依據此款，幾個教區組成一個教省。

中國天主教的多個教區面臨沒有教省的問題。首先是四大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由於是獨立的城市，直轄市在市政系統方面不屬於任何省份；對於教會而言，雖然是教區，但缺乏教省的幅度，與上述教會法有明顯的出入。

其次是以省為單位的教區，如黑龍江、吉林、遼寧、廣西、雲南、寧夏、湖南、安徽、貴州、江西等，一個行政省為一個教區。那麼，問題隨之而來，教省的範圍由那些教區構成？那一個是總主教區？

依據法典434條，「區域性教會主教會議，有權加強在該區域的合作及共同的牧靈工作。」即教省的成立，為了彼此的合作與牧靈。由於市政系統劃分導致教會教區制度的煩擾，應加強教會的教省制度，直轄市教區應

就地區範圍，與鄰近教區或教省共同協商，解決當下這一問題。對於以省為單位的教區，明顯的是由於教務的滯緩或衰退而做的不得已舉措，更是由於此，教省觀念尤為重要，彼此協作，共同協商，方顯教會一家的本色。

2 教區範圍劃分的問題

教會法典 372 條 1 項，「為使一部份天主子民成立為教區或地區教會，通常應劃出固定的地區，其中包括在該區內居住的所有信徒。」

中國的城市化急劇發展，導致一個城市有若干個教區，試舉三個案例。其一，現今所熟知的武漢教區，包含之前的漢口總教區、武昌教區、漢陽教區三個教區，過去由於修會不同、建立本地教會及交通不便而劃分三個教區。現今都歸屬武漢市的三個區，而地鐵、長江大橋解決了交通不便的問題，交通沒有任何問題，如若再以過去的教區劃分，著實不便，現在以武漢教區稱之。

其二，西安市政範圍包含三個教區，西安教區、三原教區和周至教區。周至縣行政劃分屬於西安，但卻存在周至教區和西安教區的分野，因此，一個地區城市存在兩個教區；而三原雖屬於咸陽市，但地鄰西安，且西安和咸陽有合併趨勢。故此，一個以市為單位的教區，兩個以縣為單位的教區，雖三足鼎立，但教區範圍劃分或之前的教區建制急需合併與調整。

其三，之前的河北大名教區、永年教區，現在的行政劃分歸屬邯鄲。大名地處河南濮陽和邯鄲境界，故之前河南濮陽歸屬大名教區，如若仍以過去的教區範圍劃分，無疑混亂，故稱為邯鄲教區亦理所當然。

3 以縣為單位的教區

面對城市化的進程，諸多教區仍然以縣為單位，依循過往教區建制慣例。實則，城市化背景下，中國教會面臨牧靈結構的調整，應將重心遷移到城市方向。過往四十年的牧靈重心在於農村，故大比例投資於農村，修道人員大規模服務於農村，而對於城市牧靈，卻顯得過於冷淡。如今，城市化的牧靈結構需先轉變意識，然逐步構建城市牧靈。

以縣為主的教區大多集中於北方和西部，緣由便是農村教會的基礎良好。河北一帶如趙縣教區（行政歸屬石家莊），而石家莊是省會，趙縣教區及正定教區是否同歸於一個石家莊教區？獻縣歸屬滄州市，為了遵照過去的教區劃分，獻縣教區主教府駐紮於縣城，城市反而被冷落一旁。景縣教區亦然，景縣屬於衡水市，主教座堂位於景縣。

山西省有八個教區，主要以農村教友為主，其中三個教區依循之前的教區劃分，以縣為單位。汾陽歸屬呂梁市，第一批國籍主教之一的陳國砥便是汾陽教區的首任主教；洪洞縣歸屬臨汾市，洪洞教區主教座堂坐落於洪洞縣城；新絳縣歸屬運城市，新絳教區是山西最早的教會基地，起源自利瑪竇時代。

雖舉以上例證，但仍有很多以縣為單位的教區。可從以下幾個原因查考，其一出於教會聖統制的法理因由；其二教會事務發展遲緩；其三面對城市化牧靈手足無措。故此，因集思廣益，面對城市化所帶來的衝擊。

4 教區合併或撤銷的問題

依據當下的中國教會現狀，教區調整是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教區合併的直接因素是地方教會的發展不善，教務滯緩，甚至急劇衰弱，而導致教區合併成為以省為單位的教區。例如湖南教區，之前有長沙、常德、衡陽、沅陵教區，合併為湖南教區（1989年前合併）；哈爾濱教區（1959年由哈爾濱宗座署理區、齊齊哈爾監牧區及佳木斯監牧區合併成哈爾濱教區，1983年起易名至今）；安徽教區由3個教區即蚌埠、安慶和蕪湖教區，另有1個屯溪監牧區，於2000年合併。其他如吉林教區、江西教區、雲南教區、廣西教區等都以此方式解決當下的實存問題。

根據教會法典 431 條 3 項，「惟教會最高權力，得在聆聽有關主教後，成立、廢除或調整教省。」無論是合併還是撤銷涉及一個問題，上述法典條款已提及，不再贅述。重要的問題已經突顯，即牧靈滯緩、福傳力弱，此點需要得以改善，不然日後其他教區的合併亦是可見之事。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教會的本地化態勢在梵蒂岡駐華代表剛恒毅樞機的引領下，教區的建制逐步建

立。¹⁵ 改革開放後，城市化背景下，天主教教區系統因應時代的不同而有所調整。若干教區缺乏教省制度，教區範圍重疊引發教區劃分的問題，農村化教區所帶來的問題引發對城市牧靈的茫然，教區合併與撤銷足證教會發展的滯緩和衰弱。故教區問題將是中國教會未來面對的重頭戲，中國教會對此問題應引發足夠的重視、討論與重整。

四 廣東教省之牧靈困境與展望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佈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標誌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式啟動，本規劃近期至2022年，遠期則展望到2035年。作為繼美國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之後，世界上第四個建立起來的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致力於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豐富「一國兩制」的內涵，進一步密切港澳與內地，尤其是廣東省各地區的合作交流、促進「一帶一路建設」，落實我國「絲綢之路」經濟帶，打造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

15 1924年5月15日至6月12日，天主教上海會議召開，這是中國天主教歷史上第三次代表會議，也是第一次全國性主教會議（又稱中國教務會議）。在對傳教區的劃分上，《決議案及法令》決定將中國傳教區由原來的5大傳教區重新劃分為17大傳教區：蒙古、東三省、河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蘇皖、河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和黔桂滇教區。而教省的劃分應依中國國內行政區而定，並以主教公署所在城市命名。

1 牧靈困境

粵港澳大灣區涵蓋兩個特別行政區及廣東省的九個城市，分別是香港、澳門、廣州、深圳、佛山、珠海、東莞、惠州、中山、江門、肇慶。按教會的劃分，則是橫跨了四個教區及一個地方教會，即香港教區、澳門教區、廣州教區、江門教區及深圳。

粵港澳大灣區致力於成為世界級的城市群，並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及教育及人才高地，就必然會吸引更多高素質、高技能、高文化的人才湧入，其中免不了教友的存在，這就要求我們針對這類羊群提供更高素質的牧民服務，以前僅以滿足教友聖事性的需求為標準是遠遠不夠的。這涉及到教會方方面面的工作，例如有關信仰的傳媒、靈性陪伴的服務、慈善機構的完善等等。然而，目前的老一輩司鐸雖具有吃苦耐勞的精神，且為當地教會傳承及發展貢獻良多，但不得不承認，由於特殊的時代背景，他們所受培育有限，加之又常常奔波於牧靈第一線，後期「充電」的機會也並不是很多。

聖召短缺與培育匱乏日益嚴重。廣東教省修女聖召的短缺將會導致教區修會的消失，如湛江教區女修女會人數不多，但最年輕的已經四十歲，汕頭、梅州和江門教區的教區女修會一樣，呈現如此格局，意味著三十年後教區修會的消失，不僅廣東教省，亦是整個中國教會的教區女修會的現狀。神職聖召一樣，湛江和江門教區個位數的狀況，致使教會事務發展緩慢。神學培育與更新同樣滯後，為司鐸而言，大都畢業於兩千年之前，不

論過去的神學是否完備，但二十年後的今天，有必要更新神學培育。為修女而言，大多沒有讀過神學，而且服務於堂區，導致牧靈方面的短板。故神學培育與更新應成為應急之事。香港教區舉辦的「司鐸學習營」也給予了我們很多借鑒，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定期舉行主題性的培訓與學習。廣東不同教區有不同的牧靈狀況，但為城市堂區尤為關切。很多城市市區都只有一座教堂，有的也只會有一位司鐸。例如江門教區，司鐸匱乏，幾乎每人負責一座城市，佛山、珠海、肇慶、江門、中山等。解決司鐸匱乏之事並非朝夕之力，是否可從另一方法解決，亦在探索之中，例如廣佛同城，廣州教區可修建教堂於佛山某地，以解決教友牧靈之需。另一方法就是培養教友，之後討論。深圳教會亦需做調整，有來自河北、山東等地不同地方的神父在那裡修建教堂，牧養教友，但深圳教會歸屬卻成問題。

2 大灣區展望與合作

香港和澳門的城市堂區管理經驗值得效尤。國內過往幾十年的牧靈經驗大都以農村牧靈為主，廣東教省亦不例外，將大比例的金錢、物力與人力資源投放於農村，對於城市堂區的發展投入不足。今非昔比，城市化格局吸引農村人士來到城市，故大比例的農村教友遷往生活於城市，而城市教會的管理顯得格外重要。港澳的城市化教會歷經多年，經驗豐富，故亦希望港澳教會能夠分享城市堂區的管理與牧靈，以幫助廣東教省的城市堂區發展，故廣東教省的城市化堂區管理需更上層樓。

神職借調亦可以互惠彼此。廣州教區的神父之前在聖神修院畢業，並服務於香港堂區，此舉措有雙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幫助年輕神父更好的理解司鐸職務，學習寶貴的經驗，另方面亦為香港的聖召缺乏盡綿薄之力。這項互惠性舉措，雖是短暫性的嘗試，亦可為日後的合作呈現出可行性的方向。

廣東教省內，唯獨廣州教區在教友培育方面開始探索與深化，率先而行。由於資源有限，無論人力物力，優化資源成為必要考慮的範疇。因此，廣州教區於2015年嘗試開辦「教理講授班」，為期兩年，涉及近二十個神學課程，邀請有資歷和素質的神父及香港教區教理中心的老師授課。教區層面的牧民培育，雖然無法給予深度的神學培育，但在多元化深層次方面不斷推進，對教友信仰品質的提升提供了助力。

香港與澳門在教友培育方面有獨到之處。由於人才培育的困難與缺乏，廣東教省缺乏牧靈機構，至今沒有關於婚姻前後培育的相關機構，而香港的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則有豐富的培育經驗與實踐。因應時代牧靈需要，如廣東教省在婚姻培育方面參考香港經驗，逐步建立一完備的機構，則可為廣大教省解決當下教會所面對的婚姻問題，該操作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慈善服務是教會的時代燈塔。港澳教會的慈善機構林立，機構管理健全，服務理念受大眾歡迎，為社會大眾所津津樂道。廣州教區歷年秉持教會精神，實踐對近人的愛與呵護；近年專項成立「愛心會」，對社會受困

群眾給予教會的溫暖。廣東教省在慈善服務方面需要借鑒港澳的經驗與管理，尤其明愛機構在社會中的影響力甚巨；故此，如若能夠幫助廣東教省社會服務機構作有效管理、持續經營，則能更廣泛地服務社會大眾，展現基督之愛。

嶺南文化，源遠流長，以其獨有的多元、務實、開放、相容、創新等特點，不斷為中國社會、經濟方面的發展起著探索的作用。香港、澳門與世界接軌的時代特質，亦為大灣區的穩定發展投射訊號。